

# 宜兴陶业文化遗产及其当代意义辨识

王兴平

(南京市文物局 江苏南京 210018)

**内容提要:**以宜兴为中国陶业经济文化典型,从社会文化学和遗产学角度,对其 6000 年陶业生产活动进行分析梳理和分期归纳,从中提炼出“宜兴陶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概念;陶业文化遗产对当代宜兴甚而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振兴宜兴和中国陶业经济文化有着重要作用与意义。

**关键词:**宜兴 陶业历史 陶业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在已知的我国古代成百上千的陶瓷产区中,持续 6000 年以上烧造历史并在 16 世纪异军突起,一跃登上中国古代“陶都”地位且久盛不衰的,只有宜兴。瓷都景德镇与陶都宜兴,犹如龙凤呈祥,让中国独领世界古代制瓷业与制陶业风骚。

新中国成立以来,宜兴陆续发现一些史前文化遗址和有史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陶瓷生产遗存。江苏省包括宜兴市的几代考古和陶业工作者,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学历史系、宜兴陶瓷公司和宜兴陶瓷协会等单位,作了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奠定了重要的认识基础。尤其蒋赞初先生、顾景舟先生等,在宜兴古陶瓷的发现、保护和研究事业中,功不可没。

## 一 宜兴古代陶瓷生产的文化学意义

迄今为止,关于宜兴古代陶瓷业的发现与揭示,限于既有历史条件,远不充分。但是,一些重要的文化遗址和历代陶瓷烧造遗存,能够证明宜兴陶业滥觞于 6000 年以前,而且,在 6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里,生生不息,庶几没有停歇过生产活动。

见识宜兴 6000 年陶瓷发展史,可以从时间阶段性即发展进程和空间关联性即文化属性上大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第一,史前文化时期;第二,商周时期;第三,汉魏六朝时期;第四,唐宋元时期;第五,明清时期。

### 1. 第一时期,史前文化时期

史前时期实际为两期,分属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新石器时代晚期。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主要见于原张渚区归径公社的骆驼墩和唐南村遗址、原丁蜀区狄东公社的元帆村遗址下层、杨巷镇附近的城头地、桥渎里和王府墩的遗址下层。与磨光石斧、石锛共存的典型陶器有细泥红衣陶钵、夹砂粗红陶鼎、腰檐釜(亦称宽檐釜)和牛鼻型器耳罐等。其文化特征均与太湖及钱塘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相一致,年代约为 6000~5000 年前。因此,可以推断这一些遗址的内涵性质为考古学界认定的马家浜文化类型。也因此可以见证马家浜文化的分布范围,西北面到达宜兴地区。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主要见于狄东乡元帆村遗址中层和张家村遗址、张泽乡的寿山村和前港嘴遗址、杨巷镇附近的城头地遗址、桥渎里遗址和王府墩遗址中层。其陶器生产以夹砂红陶和黄陶、泥质红陶、灰陶和黑皮陶为主,已经能够兼用手制、模制和轮制生产技术,能够利用还原焰烧成灰陶,利用闷窑渗炭法烧成黑皮陶。共存石器有石镰、双翼形石耘田器和长方形双孔石刀等。年代约为 5000~4000 年前。其文化特征与主要分布于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相类,证明良渚文化的范围,西北面也到达宜兴地区。

宜兴地区已知史前新石器文化遗址的文化学意义:一是可以在与周围地区史前文化遗存的比照中,比较出自身的文化性质、文化内涵以及共性因素、个性因素所在;二是可以在史前文化地理的梳理研究中,起到重要的地标作用。简言之,认识并确定一种类型文化的地理分布,须由相同类型文化的各个经纬度方向的代表性地点来标志。从

收稿日期 2008-12-08

作者简介 王兴平(1950~),男,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主要研究方向:陶瓷、青铜、博物馆学。

以上两点看,虽然由于发现材料不够饱满,我们对此地与太湖南面及钱塘江流域同类型史前文化的发生孰更早一些,以及此地史前文化的发展系列尚难作出推论。但是可以认为,宜兴地区是环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要发生区域。

## 2. 第二时期:商周时期

这一时期文化遗址、遗存主要见于元帆村遗址上层和杨破窑墩、张泽乡的前港嘴和寿山村遗址上层、湖滏乡画溪河西岸、善卷乡五洞桥以及杨巷镇附近城头地、桥渎里、王府墩3处遗址上层等。出土遗物有商周时期的印纹硬陶、原始青瓷、泥质印纹软陶、青铜器等,还发现烧造印纹硬陶的窑址。

对丁蜀镇青龙山南麓西窰墩出土印纹硬陶、原始青瓷以及邻近无锡、南京溧水、浙江德清、肖山等地出土此时期陶瓷所作理化测试数据,不仅表明此时期宜兴陶瓷生产原料成分与周围地区不同,还表明此时期宜兴生产的商品陶瓷,已经销售至邻近的一些地区。

此时期宜兴泥质印纹陶、印纹硬陶等还表露出与湖熟文化的可能关联。考古学界主要认为,以台形遗址和几何印纹陶为显著特征的湖熟文化,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两岸的丘陵地区。而太湖水网地区则分布着另外一种文化(马桥文化)。湖熟文化和中原商周文化在陶器等文化特征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其文化属性很可能是受到商周文化影响的商周时期地域性土著文化。宜兴位于长江下游的太湖之滨,其东、西、北部为水网地带,西南部为苏浙皖边境的山区。多年前,考古工作者已经在邻近宜兴的无锡、溧阳等地发现湖熟文化遗址或墓葬。宜兴此时期文化定型定性,考古学界尚未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宜兴地区的文化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宜兴可能正处于两种或多种地域性文化(包括吴文化和越文化)的交会点,因而兼具两种或多种地域性文化属性。

## 3. 第三时期:汉魏六朝时期

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在丁蜀镇南山北麓发现汉代窑址9处和六朝窑址7处,在南山东北麓的风水涧台地上,发现汉代窑址3处,在川埠镇石码头村发现汉代窑址1处,等等。众多的窑址表明当时宜兴陶瓷生产发展已经具有相当规模。

以南山窑群为主的宜兴汉代高温釉陶或原始青瓷,其造型、装饰等思想文化元素与长江南北各地区所产所出相比,有显著的一致性。所区别者,主要在于所取当地制作陶瓷原料的理化成分以及烧造技术。至于在装饰方法方面(如纹饰细部表现)的某些差异,其实是微弱的。这些差异对于陶

瓷技术鉴定,固然有参考意义,但在文化社会学方面,并不重要。出现这种空前的历史文化一致性的文化地理现象,是因为汉朝的政治统一与行政措施,已经实现了汉民族广大区域内的思想文化统一,已经在各个文化和工艺领域大大削弱了地域性色彩。

魏晋南北朝亦即六朝时期,中国又处于分裂时期。分裂时期,往往思想文化杂糅,文化交通塞滞,地域文化因素又得以发展和显现。此时期宜兴六朝青瓷的生产与流通非常值得关注。在现江苏境内,宜兴是迄今发现六朝青瓷窑址的唯一地区。从窑址考古和“周前将军”(周处)墓葬发掘材料看,以南山窑群为主的宜兴地区六朝瓷窑,产品精者可与同期越窑相比,其造型、装饰、工艺等文化元素也相类于越窑,将其归类于当时越窑风格体系,似无不妥。

宜兴六朝瓷业兴盛于西晋,至东晋则湮没,应该与当地豪族周氏密切相关。西晋时,周氏显赫,瓷业兴盛。东晋初年,周氏遭遇灭族,瓷业衰败。彼时宜兴瓷业与豪族周氏是何种经济社会关系,目前不得而知。但似可以认为,宜兴西晋瓷业性质,既未必产品专供周氏家族,也未必产权专属周氏家族。宜兴西晋青瓷,仍为商品青瓷,行销苏南一带。

## 4. 第四时期:唐宋元时期

已经在丁蜀镇附近及张渚区发现唐代中晚期以至五代十国时期的窑址。丁蜀镇附近,目前仅发现唐代洞众窑。而在张渚地区,发现分布比较密集的晚唐五代窑群。原属归径公社的棚山和真武殿山,烧造青釉陶瓷的龙窑(窑址),有数十之众。

已经在丁蜀和张渚地区发现一定数量的宋代窑址,尤以张渚地区分布较广。张渚区原西渚公社范围,曾有一片面积浩大的宋代窑场,至今还保存二十多个窑墩、四五十座龙窑遗址,废品堆积非常丰富。

已经在张渚区原元上公社范围发现3处延续年代可能到达元、明时代的窑墩。估计应该还有不少窑场,自唐代或自宋代持续烧造至明代以降。

唐宋元时期是宜兴陶瓷生产的转型时期。如果说,从史前文化陶器直至六朝青瓷生产活动,一直深受环太湖流域或邻近苏浙地区主流(或强势)陶瓷文化影响,到唐代,外来影响已并不显著。或者说,已不再刻意争锋或类同周边主流(或强势)陶瓷文化。这一地区烧造青瓷的生产活动,约在五代十国时期终结。从宋代起,宜兴陶业专于烧造日用陶器,以适应或拓展民间日用陶瓷市场。

其中一种小口溜肩釉陶瓶,俗称“韩瓶”,在南京、扬州等地的宋、元、明遗址、墓葬或古井中,常有发现,可见其产量之大、销路之好。

在此转型期间,尤为重要的是新创紫砂器生产。于蠡墅村羊角山发现的早期紫砂窑址,实证宜兴紫砂生产已在宋代肇始。犹如柳暗花明,在理智放弃主流瓷器生产追求后,在专注民间日用陶器市场时,另辟蹊径,着意探索改革生产原料和工艺,初步开创出新的陶艺品种。

#### 5. 第五时期:明清时期

据蒋赞初先生考察,在前述蠡墅村羊角山早期紫砂窑址,中层堆积层发现有大量的宜均器残片,作风与所谓明代“欧窑”作品相似。在宜兴湖滢镇任墅石灰山麓明代龙窑群,也曾发现相当于明代中期的紫砂器残片。近两三年中,南京大学文化遗产研究所对宜兴明清紫砂生产作了历史资源调查。尤为重要的是,南京博物院考古所对蜀山明清紫砂窑址作了科学发掘,发现了半地穴式龙窑、窑具、紫砂废品等窑业遗存,从而获得了明确的考古学证据。

对于明清及近代宜兴紫砂生产和审美,明清及近代皆有著作记载,如《阳羨茗壺系》、《阳羨名陶录》、《阳羨砂壺图考》等。根据考古调查和窑址发掘,参考方志文献记载,可以认定在明代中晚期,判断在嘉靖至万历年间,宜兴紫砂生产已臻成熟完美,体系完备,并先后诞生龚春、董翰、赵梁、时朋、元畅、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等一大批声誉卓著的名家高手,形成优势传统。从此,历经清代至近现代,名家辈出,继往开来。

在这一时期传为欧窑、又称作“宜均”的仿均陶器,是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又一斐然有声的陶艺名品,是宜兴制陶业的又一智慧创新。所谓仿均,其实仅仅是仿制均釉或谓类似均釉而已,然其造型、胎骨、工艺、装饰等基本要素皆是宜兴陶器自有特色。

由于紫砂茶壶茶具和“宜均”器及缸瓦等普通日用陶制作与营销的极其繁盛,明代中晚期时,宜兴已经有“陶都”美誉。当时天下大势,处州(龙泉)窑业、磁州窑业等曾经风光一时的地方窑业皆呈强弩之末,独“瓷都”景德镇制瓷业和“陶都”宜兴制陶业,如日中天,无可比及。据《重刊荆溪县志》记载,嘉靖、万历年间,宜兴陶业已是“鬻于四方利最薄,不胫而走天下半”;“千里之外,趋之若鹜”。

综观上述宜兴古代陶瓷制造业发展轨迹,可以认为:第一时期,是当地烧制原始陶器,逐渐获得成熟制陶经验技术时期;第二时期,是当地烧制原始瓷器,逐渐获得成熟制瓷经验技术时期;第三时期,是当地烧制成熟青瓷,并能比肩浙江地区先

进制瓷水平时期;第四时期,是当地生产转型,改兼烧陶瓷为专烧日用陶器时期;第五时期,是当地发展繁荣以紫砂为重的陶器烧制业,一举荣登中国“陶都”地位时期。

#### 二 宜兴陶业文化遗产的当代社会意义

宜兴6000年左右的陶瓷生产历史,留下许多宝贵的陶业遗址遗存,留下许多宝贵的生产体验经验,留下让世界注目的历史辉煌,留下令后人难忘的历史记忆。概括说,留下许多宝贵的关于陶业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宜兴陶业文化遗产具有非常突出的“文化重要性”。这“文化重要性”的意义尤其在于,陶业文化遗产对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江苏宜兴,具有极其重要的美学、历史、科学、社会和精神价值,并且是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丰富和协调当代与未来文明的一种源泉”。

(一) 陶业文化遗产是宜兴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宜兴陶业文化遗产如同其他遗产一样,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与陶业有关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举凡陶瓷土矿藏遗址及自然环境、与陶器有关的原始制陶及生活遗址、各个历史时期陶瓷作坊遗址遗物包括窑床、工具、窑具和废品堆积等、各个历史时期陶瓷器物和传统的陶瓷手工艺技能、与陶业传统有关的祭祀或敬祖场所或文化空间、与陶业陶人有关的口头和文字传说及文献记录、与陶业传统有关的社会风俗及表演艺术或庆祝活动等等皆是。其中,各个历史时期陶瓷文物,就其所反映的手工艺技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其作为传统手工艺的物态载体,又是物质文化遗产。再则,陶业遗址及其自然或文化环境,可能是重要的陶瓷工业遗产,可能是重要的考古遗址景观,也可能是难得的村落文化景观。

在当代,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文化遗产对于世界,对于人类,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价值意义,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旅游宪章(重要文化古迹遗址旅游管理原则和指南)》指出:文化遗产“是构成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当地特征的本质,并且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是生动的社会参照点和发展变化的积极手段。每一社区或场所特别的遗产和集体的记忆是不可取代的,是现在和将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这段经典性论述用来对照宜兴陶业文化遗产的当代社会意义,发人深思。

我们可以认为,宜兴陶业文化遗产记录和反映

了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是当地优良传统文化和文明成就的突出载体和见证,凝聚了数千年宜兴人民的辛勤创造和无穷智慧,积淀了宜兴人民世代相传的精神资源和物质财富,体现了宜兴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基本特征,构成了宜兴城市个性和城市生活特点的基本要素。陶业文化遗产对于当代宜兴发展建设,不是包袱,不是累赘,也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对立因素,而是激励、启迪、支撑当代宜兴人振兴陶瓷经济文化,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再铸历史辉煌的强大智力资源和精神动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世界遗产的布达佩斯宣言》中宣告:将“努力寻求在保护、可持续性和发展之间适当而合适的平衡,通过适当的工作使世界遗产得到保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提升社区生活质量做贡献”。如何处理好陶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振兴宜兴经济(包括陶瓷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社区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正是当前宜兴市政府及其相关行政部门,也是宜兴文物博物馆工作者、陶瓷业工作者和各界民众面临的重要问题。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政府的要求,做好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完备的保护法规体系及行政规章;需要与城市建设相吻合的、切合实际的保护规划;需要市领导以及政府有关机构具有文化遗产保护的长远目光和胆识;需要广大市民的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包括新闻媒体的积极引导。

当下的宜兴陶业文化遗产保护,尚需重点加强基础性的考古调查、必要考古发掘并赖此划定文物保护单位及保护等级。同时,加强对于陶业遗产中非物质遗产项目的认识、保护与相应级别的申报。新中国成立以来宜兴已经公布了多处古代窑址为文物保护单位,但较之6000年陶业史和“陶都”历史地位,未免失之单薄。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虽然也有过一些关乎陶业的遗址调查和发掘,但毕竟数量很小,信息量不大。我们至今不能赖以全面深入地勾勒、展示和诠释宜兴陶业发展历史特别是史前和商周时期的陶业生产与生活面目。宜兴陶业文化遗产不只是理论层面的概念辨识,更主要是实践层面的实体或实际发现、保护、划定和系统建构。

(二)陶业文化遗产是振兴宜兴陶瓷经济的创作源泉

综观上述宜兴古代陶瓷制造业发展轨迹,不难看出,古代宜兴陶人从来都是因地制宜、择势而动、与时俱进、善于创新的。即使在唐宋元时期,看

似守势,其实是以转型求新的进势。进取和创新,是古代宜兴陶业的主流态势。正是凭着清醒务实、聪明睿智的积极进取和创新,最终铸就了宜兴“陶都”的历史辉煌,铸就了宜兴陶业文化遗产的无比丰厚,也赋予宜兴陶业的后来者们极其宝贵的历史记忆、知识经验和精神影响。

近半个世纪来,世界陶瓷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应用以及关于陶瓷经济市场的时间、空间的激烈竞争,使中国大陆传统陶瓷制造业明显滞后。瓷都地位已经颓失,风采不再。陶都硕果仅存的,只有紫砂茶壶茶具,尚可在国际陶瓷博览会上与人争锋,为国争光;尚可在华人艺术品收藏界主要是台海两岸受人青睐,行情看好。世界陶瓷科技发展和世界陶瓷经济市场大势,迫使中国大陆陶瓷制造业面临生存与发展选择:或在因循守旧里日益萎缩,一蹶不振;或在创新突破中跻身世界先进陶瓷行列,再显辉煌。而从现实中国大陆各地陶瓷制造业条件状况看,宜兴陶业最具希望,责无旁贷。

创新是宜兴陶业的历史选择,创新是宜兴陶业的必由之路。只有创新,才能振兴。创新的源泉在哪里,主要就在宜兴特有的陶业文化遗产。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所宣称:“文化遗产——创作的源泉。每项创作都来源于有关的文化传统,但也在同其他文化传统的交流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对陶业文化遗产开掘得越深广,当代陶人从中汲取的经验、智慧、灵感和信念就越富足。

我们不妨对宜兴明清时期陶业生产成功创新的路数和经验做一些概括分析。从总体上说,是审时度势、立足自有、锐意变革、顺应社会。从具体上说,是着重于三方面:第一,就地取材(找材),就地变材(配比)。宜兴6000年陶业史中,从来就是就地取材,开发利用当地陶土资源做制陶原材料。明清陶业的极大振兴,与变革制陶原材料有很大关系。正因为成功采用紫砂新材料,引发从采掘、配料、成型、装饰、装烧等一系列的工艺变革,遂使宜兴陶器生产进入全新境界,新创意的茶具文玩直令世人“争购竞求”。紫砂也因此成为宜兴陶业的特有标志与文化身份。从已经积淀的经验传统看,立足于当地陶土资源的变革利用,于经济学和文化学的意义,都是事关策略、事关深远的。在当今,不是不可以购进外地瓷土(如景德镇高岭土)作制瓷原材料,但这毕竟不是宜兴陶业文化积淀的特质与特色。因此,今后陶业创新,非常需要探索当地陶土资源的新开掘与新变革。第二,

引进嫁接、工艺革新。明代宜兴陶业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宜均”的创制,这个成功同样耐人寻味。“宜均”的胎骨甚而釉药的原材料都主要取自当地资源,器物的造型、装饰也是当地传统的,但是釉的配施技术,特别是敷釉所追求的视觉效果,应该是引进的、嫁接的。结果一举成功,获得认可,被世人称作“宜均”,意即宜兴的均釉器。近年来,南京、宜兴等地制陶业已经引进日本等先进国家研创的新釉料、新彩饰等,让人耳目一新。这相类于当年宜兴创制“宜均”陶器的做法。当今宜兴陶业创新,应该增强与先进国家地区的陶业交流及技术引进,通过技术嫁接引发和推进开拓创新。第三,艺术化境、艺术超境。明代中晚期宜兴紫砂器制作全面艺术化。同样做茶具文玩,各家独出机杼,极尽妙思,“毕智穷工,移人心目”,赋予产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魅力,升华产品高雅的艺术风神和艺术品位,从而赢得无数文人士大夫和市民的青睐欣赏。一批公认的名家艺人涌现,更以他们在社会、在市场的卓越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深入带动宜兴陶业的艺术创作,广泛推动海内外市场的紫砂消费。当今宜兴固然不乏中级以上职称的年轻陶艺师,但能否继承顾景舟、徐汉堂、汪寅仙等大师的思想、品格与艺术精髓,实现紫砂工艺的创新突破,是当前和今后宜兴振兴陶业经济文化的又一关键所在。

(三)陶业文化遗产是发展宜兴文化旅游的主要吸引力

宜兴地处太湖之滨,境内有山区,地质地貌独特,自然景观奇异,善卷洞、张公洞等自然景观早已名播中外,自然旅游资源可谓得天独厚。当今发展宜兴旅游业,发展宜兴文化产业和社会经济,不可不重视自然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也不可不重视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尤其不可忽略、轻慢宜兴陶业文化遗产资源。可以预言,陶业文化遗产将是开拓宜兴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宜兴旅游综合经济的主要吸引力和原动力。

文化旅游于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社会兴起,并产生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旅游宪章》(1976)。文化旅游在我国和东南亚兴起较晚,但业已呈方兴未艾之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2005)文件,对“文化旅游”这一概念作了新定义和阐述:“‘文化旅游’是指以探索发现纪念物和遗产地为主要目的的旅游方式”,“由于这些活动为所有相关人士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惠益,这种形式的旅游事实上也反过来证明了人类社区的维修与保护要求的合理性。”宜兴的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也

应该将是良性互动、共同收益的依存关系。

6000年陶瓷生产历史所积淀的宜兴陶业文化遗产,是宜兴宝贵的文化旅游资源。特别是传承至今的紫砂手工艺传统,是宜兴文化遗产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中“代表性、稀缺性、条件性、完备性、整体性以及诠释潜质”都最强的资源。宜兴陶业文化遗产,无论显性的、潜质的,无论有形的、无形的,无论物质的、非物质的,其存在内容与表现形态实际是很丰富的。据此,结合以旅游业的智性运作,可以生发多样化的宜兴陶业文化旅游项目及其旅游形式,可以带来社会文化和经济惠益的双丰收。问题主要是:(1)陶业文化遗产及陶业文化旅游于理论、于观念能否成立?能否首先被宜兴市领导以及文化界、陶瓷界、旅游界等相关方面认同接受?(2)能否在政府及在相关行政层面做出宜兴陶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发展规划,以至制定出宜兴陶业文化遗产旅游和政府行政规章?(3)能否在行动、在实践层面展开以政府为主导、以政府旅游管理部门为行政,以旅游公司和景点单位、个人为经营实体的社会化、市场化运作?(4)能否从现在起,抓紧时间、组织专人,加大力度、舍得投入,切实在宜兴陶业文化遗产的普查、考古、研究、申报、公布、保护、管理等基础方面,取得一批重要工作实绩?而这一批工作实绩,正是确立宜兴陶业文化旅游的重要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

鉴于国内外文化旅游的经验教训,鉴于文化旅游的国际共识,开展或发展宜兴陶业文化旅游事业,需要特别注意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活态系统和可能的未来模式。对于宜兴陶业文化遗产(主要是紫砂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旅游展示,应该不仅仅将它们作为历史的见证,同时也作为一个文化发展的活态系统和可能的未来模式。而且,在保持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前提下,使经营中的文化遗产保持其经济活力。对此问题,文化部门、旅游部门以及景点单位、个人都需要增强科学发展观念,解放思想、面向未来,高瞻远瞩、辩证认识。如果将紫砂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展示仅仅定位于或满足于作为历史见证,或者仅仅作为旅游展示活动,那就很可能会流于机械、静止,甚至僵化、异化。紫砂是至今仍在传承着的极富生命力的文化遗产,是存活于社会生产生活、存活于大众心中的文化生命。对于如此活跃的、新鲜的生命,仅仅做一些静态的、简单的展示介绍,会是何等粗浅。尝试、构建宜兴紫砂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旅游的活态系统,不仅可以使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特性特征以及智性趣味得到充分显

现,其形式本身也是一种文化遗产存活发展的社会方式,也是一种文化发展的创新运营方式,甚至,这些活态系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预示并影响了未来的发展模式。在笔者看来,宜兴不但具备建立这样活态系统和可能的未来模式的社会条件,而且在自由生成的诸般生产作业形态中已经出现近似的雏形或痕迹。目前在宜兴很有影响的徐汉棠大师的家庭型工作室及其文化环境,以及一些工艺师的作坊,就颇具上述“活态系统和未来模式”的意味。宜兴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在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传统陶瓷手工艺保护、传承和展示、旅游的活态系统与可能的未来模式上,取得突破,引领全国。其二,包装与展示。为了旅游展示或招徕、愉悦游客,旅游部门或景点单位、个人总是喜欢对文化景观或表现形式等作一些非真实性包装,使得“遗产项目的物理构造及其非物质方面均趋于流俗和妥协”。这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殊不知,这些人为臆造的包装,实际破坏了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及其文化表达的真实性,也破坏了景点或展示的真实性,破坏了文化旅游的真实性。长此以往,既损伤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损伤文化旅游产业。在亚洲,在中国,由于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认识尚处于起步阶段,旅游业和以旅游为目的的遗产修复、包装及其展示,往往会给真实性造成错综复杂的全新威胁。开展宜兴陶业文化旅游,对此应有所警醒和预防。

以上对宜兴陶业文化遗产当代社会意义的三点论述,主要是从振兴发展宜兴社会经济包括陶业经济、旅游经济方面阐发的,远不能够涵盖宜兴陶业文化遗产之于社会当代意义的全部方面。诸

如,陶业文化遗产还是宜兴社会教育的地方独特性宝贵资源,对于开展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教育,可以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教育的许多门类上(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操守教育、美学教育、历史教育、自然教育、艺术教育、科学教育、技术教育等)提供取之不竭的生动教材等等,不一而足。

倘若以上辨识不谬,则可以类举类推,探寻探究文首所提及的我国成百上千个古代陶瓷生产地,能否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视域内与原则上,准确、科学地对待陶业抑或瓷业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可发展利用。在世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史上,中国是地位极重、影响极大的陶业和瓷业生产大国,理所当然地,中国也应该是地位极重、影响极大的陶业和瓷业文化遗产资源大国。但是,全国范围内对于陶业或瓷业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现状,堪虑堪忧!尤让国际社会不安和鄙视的,一些古陶瓷产地大有人在无视国际共识,热衷于赝品的制造与流通,在扰乱国际国内文化(文物)收藏与流通市场的同时,无疑也在自损中国的责任形象与可信任度,自损生产地和中国陶瓷经济的长远利益;无疑也远远没有走出一条陶业或瓷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正确之路。而国家在立法、司法与行政方面的相对滞后,亦应当尽早改观。

一语以贯之,宜兴陶业文化遗产和各个古陶瓷产区的陶业(瓷业)文化遗产,既是各所在地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和世界的宝贵遗产。整合中国的陶瓷业文化遗产与其他相关遗产,一定能够为中国社会以及陶瓷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持续、宝贵的贡献。

## Identification of Yixing Pottery Industry as A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Temporary Significance

WANG Xing-ping

(Nanjing Municipal Bureau of Culture Relics, Nanjing, Jiangsu 210018)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Yixing as 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model of Chinese pottery industry. From the socio-cultural and heritage perspective, it gives an analysis of 6000-year pottery production and extracts the important concepts of the “Yixing pottery industry as cultural heritage”. It also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pottery heritage in the revival of pottery industr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Yixing and even of China.

**Key words:** Yixing pottery history; pottery cultural heritage